

# 包容性增长能促使农户参与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吗\*

## ——兼论中国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

刘 海<sup>1</sup> 杨 丹<sup>1</sup> 刘自敏<sup>1</sup> 章 元<sup>2</sup>

**摘要：**乡村善治不仅要关注包容性增长，也要摆脱集体行动困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本文构建了包容性增长影响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广义 Bonferroni 曲线度量包容性增长水平，通过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这一工具变量识别包容性增长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因果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并从贫困个体、贫困区域和扶贫效果三个维度探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包容性增长促进了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对农户而言，家庭收入越低、成员越多、土地经营面积越大、所在村庄规模越小，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促进作用越强。第二，包容性增长可通过提高农户互助水平和人际信任程度增强村庄动员能力和和谐程度，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第三，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不仅有利于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还有非经济效应。而且，包容性增长更有利于推动原贫困户、扶贫区域和扶贫效果好省份的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本文研究提供了包容性增长影响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理论逻辑和微观证据，能为政府制定促进包容性增长和村庄公共事物治理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公共事物治理 包容性增长 集体行动 非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

包容性增长指能促进机会增加和机会平等获得的增长，包括收入公平和收入增长两个核心部分。

---

\*本文是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英才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脱贫人群内生发展能力提升研究”（编号：2022YC031）、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收入不平等对农户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机制分析与福利后果研究”（编号：202321）和西南大学创新研究2035先导计划（编号：SWUPilotPlan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但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刘自敏。

包容性增长能使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 (Ali and Son, 200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sup>①</sup>。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福利的包容性增长, 可以有效促进多元化社会主体围绕公共事物开展集体行动 (杜志雄等, 2010), 通过基于理性的策略互动, 实现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 (Ostrom, 1990)。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指能够针对性供给地方性公共品, 通过集聚分散农户的力量, 为增加集体成员福利而采取的自愿行动 (Molinas, 1998)。公共事物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破解“集体行动困境”, 即个体的理性选择与集体的非理性后果的冲突 (Ostrom, 2005)。在政府和市场之外, 通过农户自主治理方式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 是实现公共事物治理的第三条道路 (Ostrom, 1990)。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有效促进了以公平和增长为特征的包容性增长, 还通过包容性增长推动了公共事物治理层面的集体行动, 对农村治理格局产生了经济效应和非经济效应双重影响<sup>②</sup>。

自 2013 年提出精准扶贫开始, 中国逐步消灭了农村的绝对贫困。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论证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产生的直接经济效应, 认为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不仅对中国摆脱绝对贫困起到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也对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产生的间接效应可能超越了贫困户脱贫本身的经济意义, 因此, 对其非经济效应的评估也需要拓展, 以便更加全面地总结该政策对中国农村发展的重大意义。从经济效应看: 一方面, 对不同致贫原因的贫困人口实施差异化的帮扶措施, 有助于帮助其拓展自生能力 (陈斌开和李银银, 2020), 通过促进机会公平降低农户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Aoyagi and Ganelli, 2015); 另一方面, 扶贫资金的精准投放, 可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 (尹志超和郭沛瑶, 2021), 促进农户收入的增长。从非经济效应看: 一方面, 精准扶贫过程中形成的贫困治理机制 (李实, 2021), 极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环境状况, 起到了培养贫困人口能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地位等间接的非经济效应 (Zhang et al., 2022); 另一方面,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形成的观念革新 (黄薇和曹杨, 2022), 在促进传统文化传承、自然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乡风文明建设等多个方面也体现了一定的非经济效应 (胡原等, 2022)。

从农村现实情况看, 目前负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行政部门并没有深入到村一级。村委会是基层

<sup>①</sup>参见《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的“三个规律”的实践思考》,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09/c\\_127373325.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09/c_127373325.htm)。

<sup>②</sup>从定义上看, 经济效应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对贫困地区产生的增收减贫效果, 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户生计改善等方面产生的经济带动作用 (尹志超和郭沛瑶, 2021)。实现经济效应是该政策的直接效应和推行的初衷。非经济效应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对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农村内生发展能力、基层公共治理、农户价值观念革新等多个方面产生的非经济性效果 (Zhang et al., 2022)。这是政策推行带来的正外部性。二者是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对农村影响同一个方面的两个不同维度, 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重要体现。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经济效应聚焦于脱贫增收等直接经济后果, 非经济效应则聚焦于推动农村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革新。

治理的正式机构，村社组织在失去土地调整权和税费收入后，经济实力大为削弱，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权威和凝聚作用也在弱化，村级层面的集体行动面临困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2021年，全国每年因公共工程老化、毁损等导致的耕地灌溉面积减少量占总耕地灌溉面积减少量的24.23%<sup>①</sup>。同时，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层治理功能弱化等问题也制约着集体行动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202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9899万人，年均减贫1237万人，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1.3个百分点<sup>②</sup>。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减贫幅度达70%<sup>③</sup>，大大缩小了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促进了农村的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不仅增强了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也可能是解决农村集体行动失灵的关键路径。

现有关于包容性增长与集体行动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精准扶贫对包容性增长的经济效应。相关研究主要从经济增长和发展公平两个方面展开。从经济增长方面看，精准扶贫能够直接帮助贫困户增加经济收入（李实，2021），间接提升其主观社会地位并增强其村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主观福利（Sen，2014）；产业扶贫能够推动更多的人口就业，从而为贫困人口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使贫困人口增收（尹志超和郭沛瑶，2021）；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可以有力地帮助贫困农户提升收入水平、摆脱绝对贫困状态（周强，2021a）。从发展公平方面看，精准扶贫政策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降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ilber and Son，2010）；以公共服务投资、金融信贷、就业扶贫等为代表的扶贫措施能够有效提高低收入农户的福利水平，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农村公平（李实，2021）。

二是包容性增长的福利效应分析。相关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开。从宏观方面看，包容性增长既关注效率，也注重公平，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张勋等，2019）。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包容性增长是益贫式增长的扩展，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的福利，而且，在经济与政治上更具有持续性（Briones，2015）。从微观方面看，包容性增长有利于降低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和弱势群体面临的机会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程度（林万龙和米晶，2023），强调和重视民众平等地享有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Sen，2014），从而可以促进低收入农户参与集体行动（Dolumbia，2019）。包容性增长能使低收入群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收益，过上有尊严的生活（Amponsah et al.，2023）。

三是在村级公共事物治理层面对农户集体行动失灵原因的分析。相关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家庭因素。家庭收入状况、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和所在村庄大姓人口占比，都会影响农户参与农村集体行动的意愿（王丹利和陈斌开，2024）。二是组织因素。在中等规模的村庄，集体行动意愿更强（Weimann et al.，2019）。村庄密度、社会信任与关系网络均对农户参与集体行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sup>①</sup>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的《中国水利统计年鉴（2022）》，相关网址为<https://data.cnki.net/yearBook/single?id=N2023110278>。

<sup>②</sup>资料来源：《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脱贫地区农民生活持续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d2020/202210/t20221011\\_1889191.html](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d2020/202210/t20221011_1889191.html)。

<sup>③</sup>资料来源：《5年脱贫6853万人，减贫幅度达70%》，[https://www.gov.cn/xinwen/2018-10/17/content\\_5331491.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8-10/17/content_5331491.htm)。

(蔡起华和朱玉春, 2015)。三是制度因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受多种因素影响(林万龙和米晶, 2023), 供求内容不匹配、供给方式不适当、供给机制过于单一、供给中“重建设轻管护”和“重县城轻乡村”等问题, 是农村公共服务供求失衡的主要表现(黄薇和曹杨, 2022)。即使正式的问责制度不健全, 农户依然能够通过自组织形成非正式的规则和规范, 促使政府履行公共义务(王丹利和陈斌开, 2024)。农村税费改革则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促进了农户参与集体行动(杨丹等, 2023)。

四是包容性增长对集体行动的影响。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从宏观层面看, 重视福利改善的包容性制度不仅能够有效激励私人投资(Doumbia, 2019), 还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实现公共治理绩效的改善(Ali and Son, 2007)。包容性增长能够有效促进机会公平, 降低公共产品的获取门槛, 有效促进集体行动(周小亮和吴武林, 2018)。从微观层面看, 包容性增长能够最大限度为劳动者创造就业和发展机会(张勋等, 2019), 有利于完善教育、环保等公共服务的供给, 促成集体行动(林万龙和米晶, 2023)。包容性增长的内在要求是提高成员福利、促进均衡发展(Amponsah et al., 2023), 通过推动成员福利的增长及共享, 可以促进利益分配的均衡, 进而促进集体行动(Weimann et al., 2019)。

现有文献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 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相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一, 现有文献主要分析了包容性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也探讨了影响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因素, 但是, 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 从微观农户层面分析包容性增长对集体行动影响的研究较少, 也疏于探讨内部作用机制。第二, 现有对包容性增长的测度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 且较多为综合指标, 侧重于分析宏观经济包容性对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 较少关注包容性增长的微观测度指标及其影响农户行为的经济逻辑。第三, 现有文献虽然对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多方面分析, 但主要关注增收、减贫等经济效应, 较少关注农村地区环境面貌的改善、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和社会地位的提升等间接的非经济效应。

那么, 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家庭成员的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影响能否化解其参与公共事务面临的内外部局限, 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如果能, 具体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动机。与已有研究相比, 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 将收入公平和福利改善纳入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整体分析框架, 探析包容性增长对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同时, 从社会互动、人际信任、动员能力与和谐程度等方面深入分析相关作用机制, 拓展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研究边界。第二, 基于广义 Bonferroni 曲线的测度框架, 测算微观层面的包容性增长水平, 从低收入农户福利角度分析农村包容性增长的特征及其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路径, 在微观层面深化对广义 Bonferroni 曲线的运用。第三, 从公共事物治理视角出发, 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背景下聚焦村庄层面, 采用微观数据分析包容性增长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 弥补现有大部分研究仅使用省级或市级统计年鉴中的宏观数据而无法分析微观主体行为的不足。第四, 创新性地从非经济效应视角探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提高农户非经济福利的结果, 拓展中国情景下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边界。同时, 以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为政策性工具变量, 识别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因果关系, 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分析包容性增长对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并从内驱和外推两方面分析具体的作用机制，进而提出相关研究假说。

### （一）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

包容性增长包括收入公平和福利改善两个维度（张勋等，2019），能够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产生直接影响。从收入公平方面看，包容性增长旨在通过消除外部环境的差异，保障所有人有公平的权利参与经济增长并分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增长（黎茵娴和边恕，2021），本质是促进公平，保障所有经济主体尤其是穷人的公共福利（Kumar and Moharaj, 2023）。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公共福利（苏毅清等，2020），公共品的公平供给往往直接决定了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和水平（杜志雄等，2010）。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平等地分享公共福利，进而促使其参与集体行动。从福利改善方面看，福利增长是合作的基础（王丹利和陈斌开，2024）。在发展经济学视角下，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在于以包容的理念促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持续增进社会福祉（Kvist, 2020）。持续且稳定的发展前景能够增强农户对合作取得稳定收益的预期，进而促进农户参与集体行动（Bardhan et al., 2007）。包容性增长能够促使农户通过公平合作有效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应对区域的“市场失灵”和区域合作的“囚徒困境”，在提高农户效用的同时提高社会整体效用（张志原等，2019），进而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因此，本文提出下述研究假说。

H1：包容性增长能够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 （二）包容性增长促使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内驱机制分析

内部资源调动是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个体的内生动力是经济行为的基础，决定了农民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包容性增长通过提高农户间的社会互助程度和人际信任水平，增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从内部驱动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具体来看，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互助和人际信任两个方面。农村社区的社会互助程度能够体现农村公共事物治理的内在能力，是社区自治的基础（Briones, 2015），社会互助水平较高的社区往往能有效组织集体行动。包容性增长能够将更多个体纳入生产财富的分配范围，切实改善贫困人群的生产生活条件（Doubbia, 2019），提高农户间的互助水平。在人口数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随着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升，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参与经济的机会会更加公平，社会矛盾得以缓解（Aoyagi and Ganelli, 2015），社会不平等现象趋于缓和，从而也会促进不同收入水平农户之间的互助（赵学刚和林文轩，2017）。在熟人社会，邻里之间的社会互助是有效动员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关键（王丹利和陈斌开，2024）。在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的村庄，农户收入分化程度较低，村庄能够较为公平地分配相关资源，农户之间能够保持较高的社会互助水平，社会互助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乐章和向楠，2020）。因此，本文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说。

H2：包容性增长可以提高农户间的社会互助水平，进而提升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包容性增长的一个隐含前提是对贫困人口能力的尊重和信任，强调贫困人口能够且应该积极参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不是作为被动的受助对象（张鹏龙等，2024）。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会对人们的社会心态产生积极作用，降低农户间的相互猜忌和不满，进而减轻农户对合作的排斥和不信任（Amponsah et al., 2023）。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在解决公民共同面临的公共性问题时具有促进共同合作、达成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黎茵娴和边恕，2021）。公共治理理论认为，人际信任是集体行动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Ostrom, 2005）。包容性增长会更多地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利益，降低合作中的不稳定因素，提升农户的人际信任水平，进而有利于农户间开展大规模合作（陈荣卓和车一頓，2022），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说。

H3: 包容性增长可以提高农户的人际信任水平，进而提升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 （三）包容性增长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外推机制分析

个体行为嵌入在社会环境之中，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史恒通等，2018）。包容性增长通过提高村庄的动员能力和和谐程度，能够改善村庄层面合作的基础，进而从外部推动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村庄动员能力指村庄管理组织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而调动内部和外部资源的能力，是村庄处理公共事务的基础（林万龙和米晶，2023）。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的村庄，农户收入水平较高、分配较为公平，较容易将集体目标与农户利益紧密结合，进而增强村庄动员能力（黎茵娴和边恕，2021）。动员能力是个体合作意愿的重要外在驱动因素，可以增强个体的内驱力。这种影响在公共事物治理过程中尤为明显（王亚华和舒全峰，2021）。组织支持理论认为，将组织目标和价值与动员对象的利益和信念有机联系起来的社会动员（林万龙和米晶，2023），以及集体认同感的激发，可影响村民个体的行为决策，引导个体做出有利于提升村庄社会福利的行为选择（Amponsah et al., 2023），进而增强农户参与村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效能。因此，本文提出相关研究假说。

H4: 包容性增长有助于提高村庄的动员能力，进而提升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的村庄，能够打破精英绝对支配的格局，满足中低收入农民在资源获取和分配方面需要更多制度保障和社会支持的诉求（Molinas, 1998），有利于增强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和谐程度（侯麟科等，2020）。在一个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的村庄治理环境下，正式的治理主体并不排斥非正式治理主体，而是会积极吸纳后者，并建构畅通的参与渠道、设立体系化的参与程序，从而提高村庄内部的和谐程度（Doumbia, 2019）。和谐的社会关系可以修正个人偏好，使个人行为具有利他主义倾向，通过重塑农民的身份认同和形成环境利好认知（杨婵和贺小刚，2019），提高农民参与治理家园的意愿，最终实现农村善治，有效促成村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章元等，2022）。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相关研究假说。

H5: 包容性增长有助于提高村庄的和谐程度，进而提高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本文的研究逻辑如图 1 所示。包容性增长通过内部驱动和外部推动两个机制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本文尝试通过探讨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其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可行路径，进而进一步归纳实现农村集体行动的有效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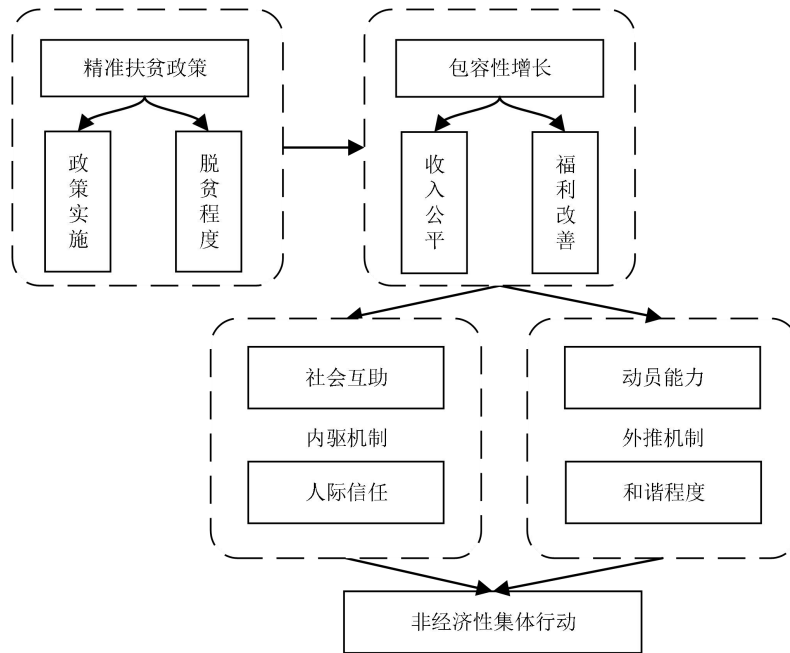


图1 包容性增长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逻辑

### 三、实证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的数据包括公开的微观数据和手工整理的数据库。公开的微观数据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简称 CLDS）数据库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的信息。CLDS 数据库是第一个以劳动力为调查对象的全国性、综合性跟踪调查数据库，样本区域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5%，能够真实反映中国农村家庭、村庄等多个层面的实际情况。该数据库以劳动力的收入、教育、就业、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现状和变迁为核心内容，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进行调查，数据包含本地农户收入、工作、社会活动等情况，契合本文的研究目的。由于本文的考察对象为农户，故只保留了拥有农业户口的样本，处理后的总观测值为 27060 个。此外，手工整理的数据库包括全国各省份贫困等级数据、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的 2019 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数据。

#### (二)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根据 Ostrom（2005）对集体行动的阐释，本文关注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指不以营利为直接目标的集体行动。具体而言，以农户是否参与村内公共工程（参与修建村庄庙宇或祠堂、学校、水利设施等）、村庄公共服务（参与邻居或村庄范围内的公共活动）和村民自治（参与本村的选举投票活动）作为是否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代理变量。

与以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表征的经济性集体行动（杨丹等，2023）相比，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这种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实际上是一种公共品性质的集体行动，关注的是村庄公共福利，提供的是公共物品，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因此，“搭便车”问题较为严重。经济性集体行动实际上是一种俱乐部产品性质的集体行动，关注小团体内部的福利，提供的是俱乐部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第二，具有俱乐部性质的经济性集体行动更多考虑的是俱乐部成员的经济福利，成员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其追求的目标；具有公共品性质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除了考虑经济效益外，还会考虑精神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非经济效益，兼顾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的综合效益最大化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第三，对经济性集体行动而言，按照投入比例分享收益，不同农户因出资比例不同而收益不同，进而可能出现富裕农户因出资比例较大而攫取普通农户利益的“精英俘获”现象。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而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搭便车”问题，因为农户得到的收益相同，而付出的成本不同，富裕农户出于提高声誉、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考虑会额外付出一定成本，以促成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由于这种收益不具有排他性，从而可能会引发普通农户的“搭便车”行为。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包容性增长，主要用社会包容度指数测度<sup>①</sup>。现有关于包容性增长的测度方法包括多维指标和单一指标两类。多维指标包括世界经济论坛在1990年建立的人类发展指数，该指数衡量了各国收入和非收入层面的发展情况。还有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成果共享、社会机会公平、个人能力等方面构建的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但这种指标构建方式的最大缺点是在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时过于依赖主观判断，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理论依据。单一指标从收入差距或收入增长视角衡量包容性增长。例如，黎蒨嫔和边恕（2021）认为，通过建立增长关联曲线，可以直观描绘经济增长中的不平等现象。Silber and Son（2010）则通过广义 Bonferroni 曲线衡量包容性增长，广义 Bonferroni 曲线的优点是能够较好地关注到低收入群体<sup>②</sup>。

借鉴 Ali and Son（2007）的研究，本文将包容性增长理解为机会均等的增长，即通过包容性的制度安排实现增长效益的大众共享。在这一范畴下，广义 Bonferroni 曲线给出了较为有效的包容性增长

<sup>①</sup>该测度方法的优点在于：第一，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整体收入的变动情况。该方法的重大优势是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变化更敏感，而中国低收入人群比例高，这使广义 Bonferroni 曲线更加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也能体现对低收入群体更多关注的包容性思想。第二，比较容易量化和测度。收入是和居民生活最贴近的经济变量，可以从生活水平、福利、社会发展等多个角度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收入数据具有良好的量化特性，而福利、社会发展等指标则有一定的模糊性，测度误差较大。第三，采用单一指标测度，具有简洁、直观、易操作的优点。

<sup>②</sup>选取该测度方法的原因在于该指标有如下特性：一是尺度不变性，即全部社会成员同时乘以或除以同一个数，曲线不发生变化；二是单调性，即随着经济正向增长，函数值也随之增加，即该函数是单调非减的；三是弱转移性，即当收入由低收入人群向高收入人群进行任意一次转移时，会使得不平等程度上升，经济增长包容度下降；四是广义 Bonferroni 曲线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变化情况，该曲线对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变化更加敏感，有利于反映贫困人群参与经济机会的社会公平度与经济增长的包容度。



的测度方法（徐强和陶侃，2017）。基于广义 Bonferroni 曲线的测度框架（Silber and Son, 2010）计算的社会包容度指数，通过计算包容性增长框架下每个人能获得的包容性增长量与全部社会成员的人均收入之比得到，取值范围为 0~1。取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制度与分配结构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越低，反之则越高。当社会包容度指数为 1 时，全社会的财富被平均分配，个体之间不存在收入差异且能获得同等效用的社会福利，此时包容性增长达到理想状态。

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Bonferroni 曲线被定义为：相应累积人口比例下，收入分布中累积人口<sup>①</sup>的收入均值与总体均值之比，具体的测度方式为：

$$B(p) = \frac{\mu_p}{\mu} \quad (1)$$

(1) 式中： $\mu$  为社会总体的收入均值， $\mu_p$  为第  $p$  分位数下累积人口的收入均值。定义农户 Bonferroni 指数  $B$  为农户家庭收入 Bonferroni 曲线、纵轴和  $B(p)=1$  所围成的面积，计算公式为：

$$B = 1 - \int_0^1 B(p)dp \quad (2)$$

考虑到 Bonferroni 曲线可能存在截面交叉现象，从而使跨区比较失效，故本文将平均收入引入 Bonferroni 曲线，得到广义 Bonferroni 曲线。广义 Bonferroni 指数  $B_G$  计算公式如下：

$$B_G = \mu B = \mu \left[ 1 - \int_0^1 B(p)dp \right] \quad (3)$$

进一步，借鉴 Sen (2014) 的研究，基于广义 Bonferroni 曲线定义广义 Bonferroni 指数  $\bar{y}^*$  为社会中每人所能获得的收入水平：

$$\bar{y}^* = \mu(1 - B) = \mu - B_G \quad (4)$$

由此可知，广义 Bonferroni 指数  $\bar{y}^*$  是由广义 Bonferroni 曲线、直线  $B(p)=1$  和坐标轴所围成图形的面积。此外，依据古典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的分解方法，本文将广义 Bonferroni 指数  $\bar{y}^*$  分解为社会包容度指数  $\rho$  与人均收入  $\bar{y}$  的乘积。社会包容度指数  $\rho$  可表示为：

$$\rho = \frac{\bar{y}^*}{\bar{y}} \quad (5)$$

由此可知， $\rho \in [0, 1]$ 。社会包容度指数越小，包容性增长的水平就越低。借鉴徐强和陶侃 (2017) 的研究，本文将社会包容度指数作为包容性增长的代理变量。该变量既包含了社会不平等的部分，也包含了经济增长的部分，是度量包容性增长的有效方式。

<sup>①</sup>此处的累积人口指某一收入分位数水平下所累积的全部人口数量。例如，25%分位数收入水平下的累积人口指收入水平在 0~25%的全部人口。

各省份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sup>①</sup>显示,全国包容性增长水平的均值为0.406,各省份包容性增长水平总体波动较小。北京市、广东省、浙江省等发达省份,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欠发达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水平位于均值以上。可能的原因在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共享水平较高,从而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欠发达地区受精准扶贫等帮扶政策的影响,包容性增长水平也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游的湖北省、河南省、江西省等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水平处于均值以下,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主要由区域内富裕地区带动,内部发展差距较大,从而包容性增长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工具变量。本文以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村庄脱贫程度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属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变量,其实施和推进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决策,对农户而言是外生的,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要求(李玉山等,2021)。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作为工具变量的逻辑在于:精准扶贫政策针对性地将政策重点聚焦于农村贫困人口,中央、省、市、县等各级政府从财政转移支付、税收减免、专项扶贫贴息等方面对这部分群体予以扶持(周强,2021b),极大缓解了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缩小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提高了农村包容性增长水平。但是,直接以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为工具变量仍存在不足: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会造成估计标准差较大、估计效率较低等问题(陈斌开和李银银,2020)。为使实证分析更完善,本文进一步以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村庄脱贫程度的交乘项为工具变量。

参考周强(2021b)的研究,本文将2015年作为精准扶贫政策冲击的时间点,选取这一时间点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央虽在2013—2014年就提出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但从政策提出到实际落地执行仍需要一定时间。根据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等部门印发的《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2014年各省(区、市)的主要任务是对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完成对贫困户的识别工作。建档立卡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前提,只有实现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才能使精准扶贫相关帮扶措施在后续的扶贫项目安排、资金使用、帮扶措施、帮扶责任人和脱贫考核中精准发挥作用。因此,在建档立卡完成前,具体帮扶工作大多尚未全面启动。第二,从建档立卡的实施历程看,首轮建档立卡和扶贫对象基础信息采集工作于2014年10月底完成。然而,在政策实施初期,面临着识别不精准、扶持不精准等诸多困难,实施效果并不好。因此,在首轮建档立卡实施的基础上,2015年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进一步提高了贫困户识别精准度,也大幅提升了精准扶贫政策因人施策的准确性。同时,为了进一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本文从经济状况(是否为原贫困户)、扶贫区域(区域内是否有原国家级贫困县)和扶贫效果(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综合评价)三个方面分析不同场景下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差异化影响。

4.机制变量。为了解释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作用机制,本文以农户层面的社会互助(农户之间是否有互助行为)、人际信任(本村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村庄层面的动员能力(本村是否组织过以本地居民为主要参与者的文化或节庆活动)、和谐程度(村民之间的关系和

<sup>①</sup>篇幅所限,具体结果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zgncgc.ajcass.com)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录中的附表1。

谐程度)为机制变量。

5.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户主特征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学历和健康水平,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成员是否有人是少数民族、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家庭支出;村庄特征包括村庄规模、村庄收入、村庄收入差距。

相关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测度	观测值数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农户是否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至少参与了一种类型的集体行动=1,未参与任何一种类型的集体行动=0	27060	0.473	0	1
包容性增长	基于广义 Bonferoni 曲线测度的社会包容度指数	27060	0.406	0.136	1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	根据样本调查时间划分:2015年之前=1,2015年及之后=0	27060	0.506	0	1
村庄脱贫程度	非贫困家庭数占该村家庭总数的比例(%)	27060	0.703	0.396	1
社会互助	您与本村其他居民有互助吗:非常多=5,比较多=4,一般=3,比较少=2,非常少=1	16959	3.606	1	5
人际信任	您对本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吗:非常信任=5,比较信任=4,一般=3,不太信任=2,非常不信任=1	16960	3.869	1	5
村庄动员能力	本村有没有组织以本地居民为主要参与者的文化节庆活动:有且定期举行=3,偶尔有但不定期=2,没有=1	5376	1.893	1	3
村庄和谐程度	村民之间的关系和谐程度:非常高=5,比较高=4,一般=3,比较低=2,非常低=1	26363	3.981	2	5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岁)	27060	51.879	15	91
户主性别	户主性别:男=1,女=0	27060	0.918	0	1
户主学历	大专及以上=4,高中、中专、职高=3,初中=2,小学及以下=1,未上学=0	27060	1.660	0	4
户主健康水平	非常不健康=5,比较不健康=4,一般=3,健康=2,非常健康=1	27060	2.322	1	5
少数民族	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少数民族成员:是=1,否=0	27060	0.124	0	1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人)	27060	4.231	1	20
土地经营面积	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包括耕地、林地、牧场、水塘在内的所有土地类型(亩)	26646	7.917	0	4088
家庭收入	家庭年总收入(万元)	27060	2.912	0	21.156
家庭支出	家庭年总支出(万元)	26937	2.842	0.039	20.292
经济状况	家庭是否是原贫困户:是=1,否=0	10362	0.157	0	1
村庄规模	村庄总户数(百户)	26614	8.502	0.560	534.590
村庄收入	村庄人均年收入(万元)	26227	0.348	0	8.815

表1 (续)

村庄收入差距	采用 Kakwani 相对剥夺指数测度	27060	0.198	0	0.507
农户主观福利	农户幸福水平: 非常幸福=5, 幸福=4, 不清楚=3, 不幸福=2, 非常不幸福=1	13014	3.675	1	5
扶贫效果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综合评价情况: 好=1, 其他=0	27060	0.367	0	1

注: ①表中涉及货币的变量(家庭收入、家庭支出和村庄收入)均以201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②扶贫效果为手工整理变量,赋值依据主要参考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的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相关资料来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2019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08/content\\_5509889.htm](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08/content_5509889.htm))。考核结果显示,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综合评价为“好”。③对村庄规模而言,如果以户为单位,与其他变量的数值差距较大,而且在表5的异质性回归中几个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数值均为0.000,因此,这里以百户作为单位。

### (三) 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为探究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X_{it} + \alpha_2 L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6)$$

(6)式中: $i$ 代表农户, $t$ 代表年份, $Y_{it}$ 代表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X_{it}$ 表示包容性增长, $L_{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mu_i$ 为农户固定效应, $v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alpha_0$ 为常数项, $\alpha_1$ 衡量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 $\alpha_2$ 为控制变量估计系数。

2. 机制检验模型。本文参考陈梅和李磊(2021)的研究,构建如下作用机制检验模型:

$$M_{it} = \alpha_0 + \alpha_3 X_{it} + \alpha_4 L_{it} + \mu_i + v_t + \xi_{it} \quad (7)$$

$$Y_{it} = \alpha_0 + \alpha_5 M_{it} + \alpha_6 L_{it} + \mu_i + v_t + \gamma_{it} \quad (8)$$

(7)式和(8)式中: $M_{it}$ 表示包容性增长影响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机制变量,包括社会互助、人际信任、村庄动员能力与村庄和谐程度; $\alpha_3$ 是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衡量包容性增长对机制变量的影响; $\alpha_5$ 衡量机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alpha_4$ 和 $\alpha_6$ 为控制变量估计系数; $\xi_{it}$ 和 $\gamma_{it}$ 为随机扰动项;其他变量和参数含义与(6)式一致。

## 四、实证结果

### (一) 包容性增长与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特征化事实

为考察包容性增长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变化趋势及演变规律,本文将从收入等级<sup>①</sup>和分仓散点

<sup>①</sup>收入等级依据家庭收入在全国农户收入中的相对位置进行划分,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将全部样本均分为五等份,处于最低20%的收入家庭为低收入组,其余依次为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

图两个角度分析包容性增长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特征化事实。

从不同收入等级下包容性增长与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演变趋势可以看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包容性增长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则呈快速上升然后缓慢下降趋势<sup>①</sup>。这说明，农户收入等级越高，包容性增长水平与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比例也更高。可能的原因在于，收入等级高的农户，资源禀赋较好，有能力参与涉及公共事物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在收入位于中等偏下收入组时，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比例最高，可能的原因在于，这部分农户没有处于完全贫困状态，具备一定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但又无法独立支撑自身的快速发展，仍需通过合作获取充分的发展资源，从而能够保持较高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水平。

为分析包容性增长与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演变规律，本文绘制了分仓散点图<sup>②</sup>。由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为 0-1 变量，采用普通散点图会导致因变量密集分布于 0 和 1 两个区域，难以看出变量间的关系。分仓散点图通过分组聚类方法可以减少散点数量，既能清晰刻画变量间关系，又能保证散点图的分布格局与总体分布相似、拟合曲线斜率不变。由分仓散点图可知，包容性增长与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农户更愿意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 （二）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

1. 基准回归。本文首先基于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的数据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2。由表 2（1）列回归结果可知，包容性增长显著提高了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由表 2（2）列和（3）列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个体、家庭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后，包容性增长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依然显著，包容性增长水平越强，农户越愿意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假说 H1 得证。

表 2 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1）		（2）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包容性增长	0.271***	0.085	0.178**	0.081	0.573*	0.304
户主年龄			0.006***	0.001	0.006***	0.001
户主性别			-0.181***	0.029	-0.172***	0.030
户主学历			-0.192***	0.012	-0.192***	0.014
户主健康水平			0.072**	0.008	0.072***	0.008
少数民族			-0.027	0.040	-0.037	0.041
家庭规模			0.005	0.007	0.005	0.007
家庭收入			0.002	0.002	0.002	0.002
家庭支出			-0.003*	0.002	-0.003*	0.002

<sup>①</sup>篇幅所限，具体结果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zgncgc.ajcass.com）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图 1。

<sup>②</sup>篇幅所限，具体结果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zgncgc.ajcass.com）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图 2。

表2 (续)

村庄规模				0.000**	0.000
村庄收入				-0.002	0.004
村庄收入差距				0.477	0.349
常数项	0.381***	0.035	0.414***	0.084	0.137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sup>2</sup>	0.004		0.132		0.131
观测值数	27060		26937		26051

注：①\*\*\*、\*\*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聚类到农户层面的标准误。

2.内生性处理。基准回归得出了包容性增长会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结论，但实证分析中可能存在以下内生性问题：一是包容性增长与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包容性增长会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但农户也可能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获取公共资源从而提高收入，进而提升包容性增长水平。二是农户包容性增长水平往往与当地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可能造成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而，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双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以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村庄脱贫程度、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村庄脱贫程度的交乘项为工具变量。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包容性增长的相关性通过第一阶段回归中的F值和平行趋势检验<sup>①</sup>展示。根据表3，第一阶段回归的F值为2920.560，大于经验法则临界值10，说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设。为检验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本文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研究期内各年份个体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将包容性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根据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前，交互项不显著且系数为负；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2015年）后，交互项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与没有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控制组农户相比，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处理组农户的包容性增长水平持续上升，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对处理组农户包容性增长有正向影响。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设。

表3 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包容性增长		被解释变量：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一阶段结果		二阶段结果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	0.012***	0.002		
村庄脱贫程度	0.013***	0.005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村庄脱贫程度	-0.015***	0.003		
包容性增长			15.695**	6.252
常数项	0.621***	0.005		

<sup>①</sup>篇幅所限，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详见《中国农村观察》网站（zgncgc.ajcass.com）或中国知网本文附图3。

表 3 (续)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Anderson Canon. Corr. LM 统计量		22.267 [0.000]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1.145
Hansen J 统计量		0.543 [0.461]
第一阶段 F 值	2920.560	
R <sup>2</sup>	0.929	-0.179
观测值数	26051	11727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圆括号中展示的是稳健标准误，方括号内为相应统计量的 p 值。

表 3 利用 Hansen J 统计量进行过度识别检验，Hansen J 统计量对应的 p 值大于 0.1，过度识别检验不能在 10%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为外生的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是严格外生的。Anderson Canon. Corr. LM 统计量为 22.267，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 11.145，大于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的临界值 8.75。以上统计检验共同说明了本文工具变量的合理性。由表 3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对包容性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包容性增长变量均显著，说明在纠正内生性问题后，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有显著正向影响。

3.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调整样本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子样本回归	
	(1)		(2)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村庄收入差距	-0.162*	0.097				
农户主观福利			0.017**	0.008		
包容性增长					0.619*	0.361
常数项	0.499***	0.083	0.218**	0.111	0.218	0.24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sup>2</sup>	0.130		0.074		0.125	
观测值数	25051		12364		20946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方面：由于包容性增长包含公平和增长两个维度，本文将包容性增长拆分成这两个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利用村庄收入差距测度公平维度。社会发展的目标不仅是物质财富增长，更是人民群众主观福利水平的提升，主观福利指标比传统经济福利指标更能体现群众对社会发展的直观感受（Silber and Son, 2010），因而本文用主观福利测度增长维度。表4（1）列回归结果表明，村庄收入差距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表4（2）列回归结果表明，主观福利水平越高，农户越愿意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公平和增长两个维度的分析均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在调整样本方面，根据本文附录的附图2，位于中等偏下收入组的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水平最高，与其他收入组具有明显差异。这部分农户可能会干扰研究结论，本文用剔除这部分群体后的子样本重新回归，结果如表4（3）列所示。可以发现，包容性增长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表4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基准回归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

4. 异质性分析。本文采用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土地经营面积和村庄规模4个变量分别与包容性增长交乘，分析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1)		(2)		(3)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包容性增长×家庭收入	-0.039***	0.010						
包容性增长×家庭规模			0.032*	0.016				
包容性增长×土地经营面积					0.005***	0.001		
包容性增长×村庄规模							-0.024***	0.004
包容性增长	1.171***	0.142	0.838***	0.147	0.903***	0.133	1.315***	0.142
家庭收入	0.024***	0.004						
家庭规模			-0.011	0.007				
土地经营面积					-0.001***	0.000		
村庄规模							0.010***	0.002
常数项	-0.216**	0.093	-0.061	0.093	-0.088	0.090	-0.295***	0.09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sup>2</sup>		0.114		0.115		0.115		0.114
观测值数		26051		26051		25684		26051

注：①\*\*\*、\*\*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由表5（1）列和（4）列可知，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村庄规模的扩大，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促进作用不断削弱，表明包容性增长更能促进低收入和小规模村庄的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由表5（2）列和（3）列可知，随着家庭规模和经营面积的扩大，包容性增长



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表明包容性增长更能促进家庭规模和经营面积较大的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 （三）包容性增长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机制

为进一步研究包容性增长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从内驱和外推两个方面分析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机制。

1.内驱机制检验。由表6（1）列可知，包容性增长对社会互助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村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农户间的互助水平。由表6（2）列可知，社会互助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互助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农户间的隔阂，促进其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假说H2得证。由表6（3）列可知，包容性增长对人际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农村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升可以提高农户间的信任水平。由表6（4）列可知，人际信任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间人际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其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假说H3得证。

表6 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内驱机制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社会互助		（2）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3） 人际信任		（4）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包容性增长	0.851***	0.232			0.448**	0.220		
社会互助			0.045***	0.003				
人际信任							0.042***	0.004
常数项	3.394***	0.248	0.237***	0.025	3.509***	0.235	0.253***	0.02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sup>2</sup>	0.015		0.052		0.014		0.056	
观测值数	16142		16142		16143		16143	

注：①\*\*\*和\*\*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从内驱机制看，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强农户的社会互动和人际信任水平，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2.外推机制检验。由表7（1）列可知，包容性增长对动员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由表7（2）可知，村庄动员能力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动员能力较强的村庄能够激发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热情，进而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假说H4得证。由表7（3）列可知，包容性增长对村庄和谐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由表7（4）列可知，村庄和谐程度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村庄和谐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集体行动的协调成本，进而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假说H5得证。由表7的结果可知，从村庄层面看，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村庄的动员能力与和谐程度，为非经济性集体行动提供必要的组织基础，保障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有效达成，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表 7 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外推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1) 动员能力		(2)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3) 和谐程度		(4)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包容性增长	6.510***	1.076			0.442**	0.192		
村庄动员能力			0.018**	0.009				
村庄和谐程度							0.014***	0.004
常数项	-1.397**	0.695	0.494	0.060	3.715***	0.131	0.466***	0.03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sup>2</sup>	0.478		0.192		0.009		0.115	
观测值数	5149		5149		25858		25858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 五、进一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

为进一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在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非经济效应，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从经济状况、扶贫区域<sup>①</sup>和扶贫效果三个方面，探究不同贫困水平下包容性增长对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差异化影响。本文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主要体现在公共工程、公共服务和村民自治等方面，精准扶贫的非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乡风文明建设、基层公共治理等方面，两者存在一致性。因此，通过从经济状况、扶贫区域和扶贫效果三个方面探讨不同扶贫场景下包容性增长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相当于间接评估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

为进一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本文构建了经济状况、扶贫区域、扶贫效果与包容性增长的交互项，分析不同场景下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影响。由于上述三个变量均为离散变量，直接与包容性增长交互并进行线性回归会使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存在偏差。参照 Hainmueller et al. (2018) 计算交互项边际效应的方法，本文利用核估计测算交互项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影响，并绘制了边际效应图。

### （一）基于个体异质性的分析

图 2 展示了基于经济状况与包容性增长交互项的边际效应。由图 2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无论是原贫困户还是对非贫困户而言，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

<sup>①</sup>扶贫区域根据所在地区有无原国家级贫困县进行划分。非扶贫区域指所在区域无原国家级贫困县，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辽宁省。扶贫区域指所在区域有原国家级贫困县的地区，包括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海南省、江西省、河南省、河北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湖南省、四川省、重庆市、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青海省。

影响均为正，表明包容性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第二，包容性增长对原贫困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效应曲线的斜率明显高于非贫困户，包容性增长对原贫困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影响更大，表明原贫困户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对包容性增长的反应更敏感。可能的原因在于，原贫困户不是不愿意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而是自身较为薄弱的资源禀赋限制了其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包容性增长能够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增强其物质基础，进而激发其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意愿。

第三，由于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包容性增长水平，同等帮扶力度下包容性增长更能推动原贫困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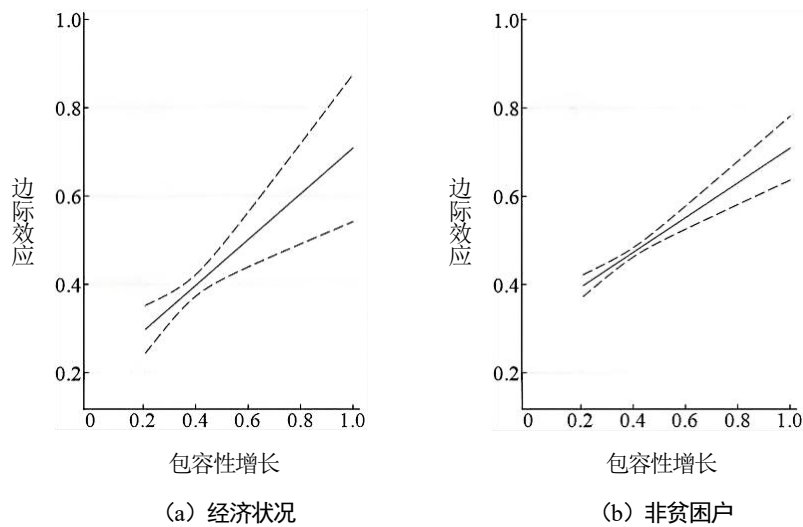


图2 经济状况和包容性增长交互项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边际效应

注：图中实线为包容性增长对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边际影响的估计值，虚线表示95%的置信区间。

## (二) 基于区域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从是否为扶贫区域出发，分析包容性增长对不同扶贫区域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异质性影响。图3展示了基于扶贫区域与包容性增长交互项的边际效应。由图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无论是对扶贫区域还是对非扶贫区域而言，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影响均为正，表明包容性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第二，包容性增长对扶贫区域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效应曲线的斜率明显高于非扶贫区域，包容性增长对扶贫区域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影响更大，表明扶贫区域农户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对包容性增长的反应更敏感。可能的原因在于，扶贫区域发展水平有限，对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投入水平较低，难以保障大规模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有序实现。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农户的包容性增长水平，包容性增长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强农户的内生动力，从而快速推动农户达成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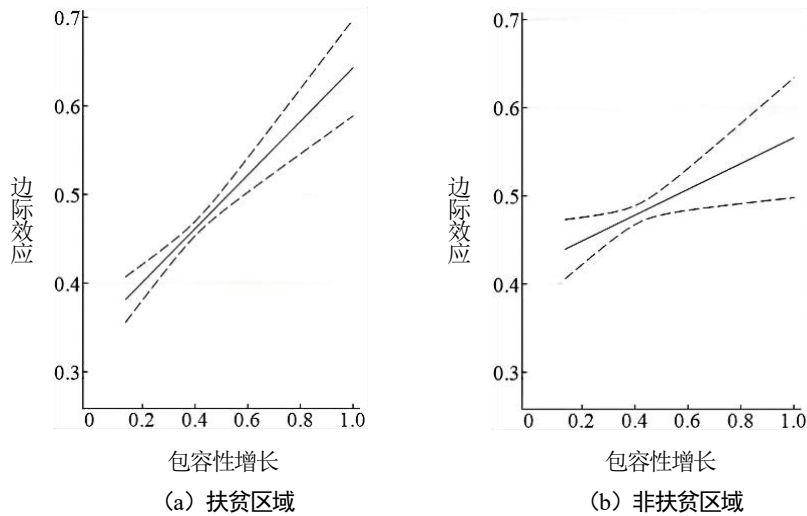


图3 扶贫区域和包容性增长交互项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边际效应

注：图中实线为包容性增长对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边际影响的估计值，虚线表示95%的置信区间。

### (三) 基于效果异质性的分析

图4展示了基于扶贫效果与包容性增长交互项的边际效应。由图4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无论是扶贫效果是好还是其他，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影响均为正，表明包容性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概率。

第二，包容性增长影响扶贫效果好的省份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边际效应曲线的斜率明显高于其他省份，表明扶贫效果好的省份农户的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对包容性增长的反应更敏感。可能的原因在于，在扶贫效果好的省份，扶贫政策有效提升了低收入农户的福利水平，农户之间资源禀赋差距较小，包容性增长水平较高，在解决涉及公共福利的集体问题时更易达成共识且具备较为丰富的合作基础，从而更能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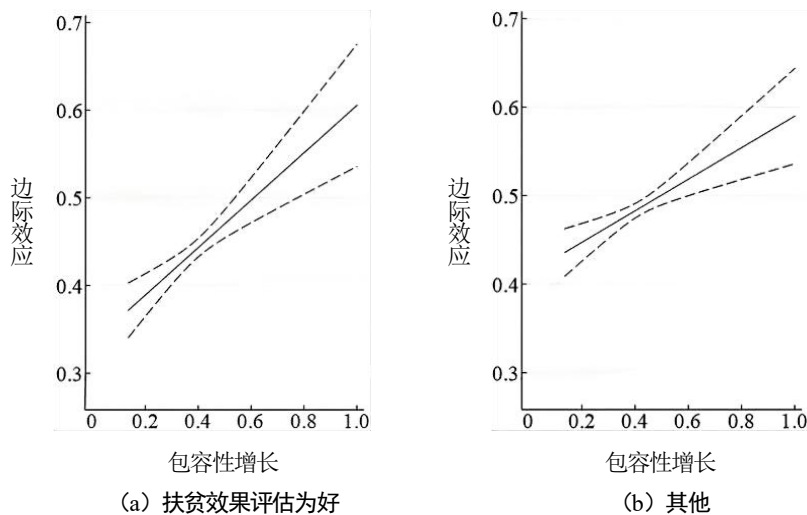


图4 扶贫效果和包容性增长交互项影响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的边际效应

注：图中实线为包容性增长对农户非经济性集体行动参与边际影响的估计值，虚线表示95%的置信区间。

##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不仅促进了农村的包容性增长,也有利于打造农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首先,本文构建了包容性增长影响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 CLDS 数据库 2012 年、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的调查数据,描述了相关特征化事实;再次,通过工具变量法,识别出两者的因果效应并探讨具体的影响机制;最后,分析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效应。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包容性增长可以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和子样本回归方式进行的稳健性检验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收入水平越低、成员数量越多、经营面积越大、村庄规模越小,包容性增长对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的促进作用越大。第三,从内驱机制看,包容性增长有利于提升农户互助水平和人际信任程度,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从外推机制看,包容性增长有利于提高村庄的动员能力与和谐程度,促进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第四,包容性增长更有利于推动原贫困户、扶贫区域和扶贫效果好的地区的农户参与非经济性集体行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过渡期继续实施帮扶政策,让低收入农户形成可持续的增收路径和均衡发展模式,进一步提高低收入农户福利水平。第二,基层政府可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等参与农村发展项目,并为其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缩小农村发展差距,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第三,基层政府也可通过构建“村委会+村民小组+互助小组”的农村互助机制,提高农户间互助水平。通过派遣驻村调解员、驻村律师等方式加强基层人才建设,及时化解农户内部矛盾,提高农户间人际信任水平,提升村庄公共事物治理效率。第四,村庄可通过确立团结友爱的村规民约,保障低收入农户在非经济性集体行动中的合法权益,提高村庄动员能力,强化村组织与个体之间的联系,促进信息共享,提升村庄和谐程度。

### 参考文献

- 1.蔡起华、朱玉春,2015:《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与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第57-69页。
- 2.陈斌开、李银银,2020:《再分配政策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税费体制改革的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第70-92页。
- 3.陈梅、李磊,2021:《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女性就业与企业出口》,《世界经济》第1期,第81-105页。
- 4.陈荣卓、车一頓,2022:《利益聚合与行动协同: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何以建构?——来自武汉市星光村的经验观察》,《中国行政管理》第10期,第65-73页。
- 5.杜志雄、肖卫东、詹琳,2010:《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第4-14页。

- 6.侯麟科、刘明兴、陶郁, 2020: 《双重约束视角下的基层治理结构与效能: 经验与反思》, 《管理世界》第5期, 第145-160页。
- 7.胡原、曾维忠、蓝红星、任彦军, 2022: 《精准扶贫提高了贫困户的幸福吗——基于 CLDS 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第5期, 第91-104页。
- 8.黄薇、曹杨, 2022: 《常态化精准扶贫政策的完善: 反福利依赖的视角》, 《经济研究》第4期, 第172-190页。
- 9.黎茵娟、边恕, 2021: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 包容性增长的识别与分解》, 《经济研究》第2期, 第54-70页。
- 10.李实, 2021: 《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 《经济研究》第11期, 第4-13页。
- 11.李玉山、卢敏、朱冰洁, 2021: 《多元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基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的经验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第60-82页。
- 12.林万龙、米晶, 2023: 《县域包容性增长测度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自然资源学报》第8期, 第2117-2134页。
- 13.史恒通、睢党臣、吴海霞、赵敏娟, 2018: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流域生态治理行为的影响: 以黑河流域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第34-45页。
- 14.苏毅清、秦明、王亚华, 2020: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影响——基于社会生态系统 (SES) 框架的研究》, 《管理世界》第7期, 第185-198页。
- 15.王丹利、陈斌开, 2024: 《公共基础设施社会参与的历史起源: 来自乡村水利建设的证据》, 《世界经济》第3期, 第151-183页。
- 16.王亚华、舒全峰, 2021: 《公共事物治理的集体行动研究评述与展望》,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4期, 第118-131页。
- 17.徐强、陶侃, 2017: 《基于广义 Bonferroni 曲线的中国包容性增长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2期, 第93-109页。
- 18.杨婵、贺小刚, 2019: 《村长权威与村落发展——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管理世界》第4期, 第90-108页。
- 19.杨丹、刘海、章元, 2023: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户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研究》, 《经济学动态》第5期, 第35-54页。
- 20.尹志超、郭沛瑶, 2021: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家庭消费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第4期, 第64-83页。
- 21.乐章、向楠, 2020: 《熟人社会: 村庄社会资本水平及其差异》, 《农业经济问题》第5期, 第66-78页。
- 22.张鹏龙、钟建乐、胡羽珊, 2024: 《防止返贫帮扶政策效果评估——基于劳动收入的视角》, 《管理世界》第3期, 第127-152页。
- 23.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 2019: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经济研究》第8期, 第71-86页。
- 24.张志原、刘贤春、王亚华, 2019: 《富人治村、制度约束与公共物品供给——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例》, 《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第66-80页。

- 25.章元、左丛民、张冰瑶, 2022: 《收入差距与集体行动——来自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证据》, 《农业技术经济》第7期, 第4-15页。
- 26.赵学刚、林文轩, 2017: 《包容性增长——基于文献的注解》, 《技术经济》第6期, 第98-108页。
- 27.周强, 2021a: 《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绩效与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第38-59页。
- 28.周强, 2021b: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统计研究》第10期, 第90-104页。
- 29.周小亮、吴武林, 2018: 《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及分析》,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8期, 第3-20页。
- 30.Ali, I., and H. H. Son, 2007, “Measuring Inclusive Growth”,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4(1): 11-31.
- 31.Amonsah, M., F. W. Agbola, and A. Mahmood, 202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verty,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Sub-Saharan Africa”, *Economic Modelling*, Vol. 126, 106415.
- 32.Aoyagi, C., and G. Ganelli, 2015, “Asia’s Quest for Inclusive Growth Revisited”,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40: 29-46.
- 33.Bardhan, P., M. Ghatak, and A. Karaivanov, 2007, “Wealth Inequal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1(9): 1843-1874.
- 34.Briones, R. M., 2015, “Small Farmers in High-Value Chains: Binding or Relaxing Constraints to Inclusive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Vol. 72: 43-52.
- 35.Doumbia, D., 2019, “The Quest for Pro-Poor and Inclusive Growth: the Role of Governance”, *Applied Economics*, 51(16): 1762-1783.
- 36.Hainmueller, J., J. Mummolo, and Y. Xu, 2018, “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Estimates from Multiplicative Interaction Models? Simple Tools to Improve Empirical Practice”, *Political Analysis*, 27(2): 163-192.
- 37.Kumar, K. K., and P. Moharaj, 2023, “Farm Size and 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 Among the Farming Communities in India”, *Outlook on Agriculture*, 52(2): 212-227.
- 38.Kvist, E., 2020, “Who’s There? -Inclusive Growth, ‘White Rurality’ and Reconstructing Rural Labour Market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73: 234-242.
- 39.Molinas, J., 1998, “The Impact of Inequality, Gender, External Assistance and Social Capital on Local-Level Cooperation”, *World Development*, 26(3): 413-431.
- 40.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43.
- 41.Ostrom, E., 2005,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3-29.
- 42.Sen, K., 2014, “Inclusive Growth: When May We Expect It? When May We Not?”,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31(1): 136-162.
- 43.Silber, J., and H. Son, 2010, “On the Link Between the Bonferroni Index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clusive Growth”, *Economics Bulletin*, 30(1): 421-428.
- 44.Weimann, J., J. Brosig-Koch, T. Heinrich, H. Hennig-Schmidt, and C. Keser, 2019, “Public Good Provision by Large Groups—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Revisited”,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118: 348-363.

45.Zhang, H., Z. Wang, J. Liu, J. Chai, and C. Wei, 2022, "Selec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Resources-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93: 318-325.

(作者单位: <sup>1</sup>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sup>2</sup>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马太超)

## **Does Inclusive Growth Encourage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s? Discussion on the Non-economic Effects of China'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LIU Hai YANG Dan LIU Zimin ZHANG Yuan

**Abstract:** Good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inclusive growth but also solve the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creating a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co-building, co-governing, and sharing public affair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that examines how inclusive growth affects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the China Labor Dynamics Survey (CLDS) data, the study uses the Generalized Bonferroni Curve measurement framework to assess the level of inclusive growth. It employs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to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 and its mechanism between inclusive growth and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The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non-economic effects of implement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dividual poverty, regional povert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inclusive growth promotes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For farmers, the lower the household income, the larger the family size, the greater the operational area, and the smaller the village size, the stronger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inclusive growth on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Second, inclusive growth enhances the level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among farmers,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mobilization capacity and harmony of villages, and promoting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Thi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not only helps improving the inclusive growth levels but also has non-economic effects. Moreover, inclusive growth is mo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in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original poverty households, poverty alleviation regions, and provinces with good poverty alleviation outcomes.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logic and micro-evidence on how inclusive growth affects non-economic collective action, offer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governments to formulate policies that promote inclusive growth and village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Keywords:** Governance of Public Affairs; Inclusive Growth; Collective Action; Non-economic Effects